

## 艰苦的人生历程与艰难的学术探索

—劳承万教授之“人生—学术”聊天录  
(2020年12月8日下午)

前言：余英时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多年前他便谈了他的一个无法传授的“学术经验”，即两个默契坦城的智者之间的随便“聊天”。他说，他喜欢常和另一史学家张灏先生在夜里的学术聊天，知己知彼，毫不拘束，天上地下，飞沙走石，古今中外，文史哲乃至生活常识……无所不谈。一杯茶一支烟，有时聊天至天明而不觉疲劳，兴致勃勃，没有终极。这些互相启发、激活的知识、感悟，是在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在任何正规高严的讲座中学不到的。知心智者之间的坦城相见，推心置腹，乃至对立观点的交锋，都是一种巨大而深刻的感悟和享受，所谓人生价值的辉煌，就在此时此地（并不在光圈光环上），在两个学术知心人之间的海阔天空的“聊天”中，其间除了“坦城”之外，没有套话、更没有假大空的说辞，你我平等，有时“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仿佛就是和自己的影子对话，不，是和天外心灵使者的对话。由此看来，两个学术知心人的“聊天”，比进入一切学术殿堂的磨炼都宝贵，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真正的学术，是需要卸下一切伪装，才能见出。学术与伪装不相容，对比当今的学术，除了伪装，还是伪装，故有本文之问答也。

**聊天人：**蓝国桥（岭南师范学院〈原湛江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简称“问”。

**聊天人：**劳承万（岭南师范学院“康德—牟宗三”研究所教授），简称“答”。

**问：**劳先生麻烦你，前几天已约好，请你就本文的题目作个简略的回答，先说说“人生”，后谈谈“学术”。这是一篇“人生—学术”聊天录，无须“饮茶”，更不必“抽烟”，张口即可。

**答：**好的。但这个题目很大又很泛，难以回答确切，只能说说简况。简单的说，于我就是：人生惨淡，学术异型。是一种特殊时代之难堪二重奏。

**问：**那就先说说你的“人生逆境”以及在“逆境”中磨炼出来的学术“心力”吧。记得前两年，上海交大的刘士林教授在公共微信中说：“不是现在没有真学者了，而是你们根本发现不了”，“什么叫学贯中西？什么是融通古今，看看（劳承万）此文就知道了”，那是指你曾在澳门大学主办的《南国学术》（2017年3期）杂志发的一篇长文“文学思想的真实及其本源”。你此文在总体方向上对中西概念的混淆作了一览性的批判。你近年的学思，你常说是“另类”惨淡人生中的血色绚丽。区别于当今“朝市之学”（钱钟书用语）以时髦的洋皮大衣与那御用的

光圈光环烘托出来的虚饰辉煌，这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刘士林的见识你认同吗？

**答：**刘士林教授是才子型教授，他对我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他的评论慢慢说吧。让我先“亮相”、自报一下家门，我是 1957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华中师院（今华中师大）中文系的。当年 5 月我们都准备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了，殊不知当年六月便开始了“阴谋”变“阳谋”的反右运动，迅雷不及掩耳。我们大学生的划右过程，不到半年，便是一个三级跳：一步、曰帮助党整风（大家一定要发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皇音一出笼，一网打尽，吓得大家无处藏身，人人自危；三步、凡大学生右派，1957 年内一律呼作“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的学生”，（大学生连大学教授，据说这些首批正规右派是 55 万），1958 年全国大反右遍及中小学和机关干部后（据英国剑桥史记载这些非正规右派为 320 万），为了专政之“一律”，把“有严重行为”的大学生也一律统入“右派”的大麻袋中去了，工资只能领大学毕业生的 60%（1956 年的大学毕业生，试用期工资是 53 元，转正为 70 元/1957 年聚降为试用期 42 元，转正为 50 元。若是大学生右派，未摘帽一律是 26 元，摘帽后为 42 元，转正后为 50 元，至 1979 年改正也仍是 50 元，后来虽艰难地提升了一级，为 57 元，但直至八十年初期不变）。我把当年的大学生右派的遭遇概括为两句话：尚未走向社会而青春已被摧毁，少小就无家可归而口腹难糊。兵书曰：“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的置于“死地”是确凿无疑的了，我要忍受；但“后生”么，一片渺茫。我只知：不置身于“死地”的“生”，往往是脆弱的小草；只有置身于“死地”的“生”，那才是青松万丈，沙沙有声。下面我将逐步说到。

**问：**能不能先把你的“右派之罪”说给我听听，以助我们年青人成长和吸收教训？灾难的历史离我们太远了，我是 1974 年才出生的呀。

**答：**可以的。我的“右”罪终生难忘：一、好出风头，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今天看来，令人发笑）。二、担任共青团组织委员，发展团员的方针是反党的。当年许多大学生都要求入团，当然争做好事的人很多，但忽视专业学习，我却说：“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比一个鲜红的党证要好得多”（在当年，“论文”与“党证”确有矛盾，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三、鸣放阶段，我担任中文系“鸣放委员会主席”期间，既不负责任，放手让大家说反动话，更加恶劣者是带领同学围攻院党委副书记，指手划脚的斥责他乱搞男女关系，令郭副书记难堪（当年师院教务长、中文系教授高庆赐先生说郭与教材科某女同志有一腿，后被撤去教务长职务，回中文系当教师，令我愤怒）……我之所以如此放荡，是由于受到我们的逻辑学老师、著名康德专家韦卓民老师的“启发”与精神激励（韦是广东中山人，今珠海人，是我们的老乡，更易交谈接近），鸣放初期，谁也不说话，学校要求教授们带动群众大胆发言。此时的韦老师首开风气之先，其曰：一、“我不怕共产党的唯物，只怕共产党的辩证”；（“唯物”，要讲客观事实，不得虚构；辩证法的古希腊原义，几乎就是诡辩）。二、“我住的房子，越住越小，我坐的车子，越坐越大”（注：韦老师原是华中大学〈教会大学〉的校长，住房较大，出入常坐小车；院系调整并入华中师院之后，以及 1953 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后，韦老师是秋风落叶，一身光秃，变成了一般教员，房子、车子归公，他到

南湖分部上课，只能坐 50 座位大客车）。三、知识分子是老乌龟：晴天万里，则把头伸出去；风雨晦暗，则把头缩回来，奈其何也。韦老师的三点意见，全刊登在当年的院报上，同学看了，都啧啧称赞，一致说，真不愧是大哲学家的诗性语言。并非凭空的捏造、诽谤，凡夫俗子是说不出的。当年的鸣放之箭，大多集中在非“党”上。庶民百姓、庸辈教授说不出这种“元叙述”的话来。怪不得，几年之后，香港的有心人，便搜索收集了一本厚厚的《大陆右派言论集》，以作历史纪念。我的第二点“名言”也收录于其中（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比一个鲜红的党证要好得多）。韦氏名言，更是收集者的珍宝。

我是 1934 年 11 月 16 日出生的（农历十月十日双十节），且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幼年丧父，无人管教，是充满野性的放牛娃。当我被划右时，才刚满 22 岁，用农村人的话说，就是“乳臭未干”。像初生的小鸡子一样，光从蛋壳里爬出来，便受到雷击而身亡。这种“罪过”，我永远忘不了呵！

**问：**那你划右后的人生旅途，为何呼作“逆境”，你能简说给我们听听么？你的顽强的意志力表现在哪里？学术“心力”是如何炼就的？

**答：**1957 年 6 月底划右后，我不能回广东老家探亲（已 10 年离家，久别老母亲和家人），已直接受管控了，后来发配（分配）到鄂西山区，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教中小学。一去便是 19 年。至 1976 年毛逝世时，才得调返广东老家。期间，被批斗过无数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实验品，教书也教过中小学一切课程：物理、化学、数学、外语、体育、美术、音乐，乃至小学一年级的复式班和函授的高等数学，我比一元钱一盒的万金油还要低贱，是一切人的工具。文革期间，也是被“借用”的批斗把子，常被交通或供销等系统拉去当作反面教材。我和他们从不相识，可谓无冤无仇，是河水与井水不相干的关系，但一旦被“借用”为反面教材，便激发了交通、供销系统陌生人的山呼海啸的“愤怒”，他们呼喊“打破老右派××”的振撼山岳的大音。当时心窍大开，我突然醒悟了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人世间谁能挑动这种陌生人（你我互不相识）的撕杀情感，西方哲学史没有记载，中国哲学史更不存在，唯有某些人才有这种本领。此类“心窍”一开，将会重组你大脑中的原始型神经系统，升华你的信息组合功能，一连串的慧识和“心窍”，便会随逆境不断而来，强化心力，会把你练成另一个人。

至于“意志力”么，全靠原始性（本能性）中国文化的滋育。《孝经·开宗明义》之首篇便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我出生后，才十个月，父亲因夜守蔗林，被贼人兄弟合伙打伤至病不治而亡，父亲死时才 28 岁，留下之寡母才 25 岁，她在艰难中带大我们四个儿女。我是最小的。因我出生于农历十月十日，即双十节，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运不佳，一出生便和国民党的生日“双十节”挂勾、重叠（阳历、农历虽有差异，但调子一样），一定遭殃。我今年已 87 岁了，回首这 87 年，真他妈的不幸：一、襁褓中丧父，失去父爱与管教；二、22 岁大学尚未毕业，便划为右派，过另类生活；三、进入高校任教后，一直处于“边缘”、人格低贱，尽管学思不俗，但尽受庸才和势利人的冷眼、歧视；四、进入老年时，妻子得乳腺癌 2009 年离开人世，留下“吾，无宁也”。长期以来，我的学术动力、心力全在“父母”血统身上，如何显示“父母之恩”？全在自己的“身”上。我的一切奢欲和信念，早已洗刷净尽，只求活

命。我的人生最终信念是希望：我的脑壳留在我的肩膀上（当年砍头的事，多的是，我只求不要砍头，让我活命）。我的右派同学，当今早已死绝了。当年的右派也只有四种出路：一、自杀，二、逃亡海外，三、遣返农村改造，终于被斗死，四、忍气吞声，苟喘残命，只求脑袋不搬家。一个人到了这种绝境就是大无畏的了，是敢于与鬼神共存的！我是第四类。几十年以来，早晨运动后，我一直洗冷水浴，从 18 岁，洗到 80 岁；80 岁—84 岁，洗温水澡；85 岁之后洗热水澡，总目的，是训练意志力。在山区改造时，冬天气温突然降至零下 20 度了，我仍是一桶水从头上冲洗下来，周身冒烟，弥漫整个洗澡间，山区人好奇，都来参观这个“广东怪物”。我的目的，是咬紧牙关，苦练意志，在绝境中求生存。划右后，韦卓民老师告诫我们：人生苦楚，要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寻找快乐。记得 1957 年匆匆从武汉上船，我便带了两本求生的书：一、蓝公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二、何思敬译：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者很难懂，那怕是硬着头皮死心的读，也不懂（中晚年才懂一些），后者，在右罪期间，手稿中之名段、名句几乎可以背诵了。当年的“天天读（背）”，我只读马克思的，很合法，别人不敢反对。几十年来，我的“身”练得如牛体一样了，至今我没有任何大病，连感冒都极少；我的观念（精神）也练得纯粹而不杂了，中西方文化与得失在我心中是一盘棋。对那些中国的假大师、假权威，一眼即能识破，这叫做“闻气味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报刊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编辑审稿，是否需要每篇都读完呢？当时便有一编辑引英国资深编辑的话为据，称大可不必每篇文章都看完：如一个鸡蛋一打开便是发臭的，你还吃完它么！这叫“闻气味法”。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大谈什么“本体论”、“实践理性”、“逻辑结构论”、“主体间性”……皆属西方概念，而非中土文化概念，是学人的生搬硬套，这无疑是一种假学问，散发出一股“臭”味，是一个坏鸡蛋。（参阅拙文（合写）：“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共六万五千字，见《清华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对西方的现当代学人，也不易上当（西方的学问是两大截：“物理学”，属数学·逻辑实证之学；“物理学之后”，属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观念认为包括四大项：本体论、宇宙论、神学、自然神学。而非中土的形而上学）。现代西方人，大多二者皆不相沾。参阅拙文《中西文化形态之大别》，见《清华大学学报》四万字，2013 年第 5 期）。当代许多中国学人，乃至名家、权威把胡塞尔、海德格尔吹成神，鄙人不相信，英裔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巴斯摩尔（1914—？）在其大著《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中说：“按原定计划本书并不涉及存在主义……因为……第一它（存在主义）对于英国当代哲学的主要倾向没有什么影响；二来就人们讨论它而言，它始终被认为是对伦理、宗教思想的一种促进因素，而不是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职业哲学家们对它嗤之以鼻”，“存在主义处于英国哲学意识之外，……它代表着大陆哲学的多余和芜杂”（洪汉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523 页）。巴斯摩尔在这里指出四个大问题：一、存在主义是“对伦理、宗教思想的一种促进因素，而不是形而上学”。二、“职业哲学对它嗤之以鼻”，即否认存在主义是一种常规哲学。三、“存在主义处于英国哲学意识之外”，即经验论哲学之外。四、“它代表着大陆哲学的多余和芜杂”。此即把存在主义排除在理性主义哲学之外，存在主义仅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多余与芜杂”。西方传统哲学是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统一体，但存在主义两者不沾边。牟宗三干脆说《存在与时间》根本就不是哲学（2019 年我在湖北避暑期间，

反思一生学术，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中西学术得失之关节论”之长文，2020年刊发于《上海文化》第4期，对中西的近代伪学问均有详细辨析，请参阅）。

**问：**你在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之特质》一书的扉页“作者简介”中，几乎囊括了你一生的学术成果，也显露了你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学术气氛。那具体情况，你能深入地谈一下吗？现当代中国学人皆缺乏你这种“自我批判”精神，精力全花在“虚无”上，光圈光环一大堆，舍不得放下，把自己压跨了而不自知，孟子说，这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

**答：**中国之文化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精神，具有一体两面性，正面，是知天命而尽性；反面，是“知耻”，人人都要苦练“吾日三省吾身”。一个人不能只有知“天命”的自我颠狂（一般表现为“自命不凡”），而不见自己的“行己有耻”（《论语·子路》），这是极可悲的，中国古代圣人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单面人”。当今学界，许多人是这种“不知耻”的单面人。

我在拙作的“作者简介”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劳承万，1934年生，广东化州人，岭南师范学院“康德—牟宗三”研究所教授。年青时遭厄运而求生，1957年大学毕业在即，便划成右派学生。此后在鄂西山区一边劳动一边在中小学里教书，过着另类的生活。此一去便是19年。中年虽身在高校，论著却多是随体制而苟喘，几本论著虽有若干心思，但多是应酬考核之作，故必是残品或垃圾。唯处女作《审美中介论》（18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属厚积薄发，是长期挣扎求生中的逆向学术意识的产物（反叛“存在—意识/主体—客体”二大块流行公式，提倡“主体—中介—客体”三大块的思维方式，借以求取学术生涯的安身立命，此书才略有意义）。学术即垃圾，是一代悲剧矣。晚年不忘王国维的严酷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因之，“忧世”要深、“择术”要慎。故而深深反思：当今中国人的学问到底应该怎么做？退休后才艰难地出版了《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10年，32万字）与《中国诗学道器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45万字）两书，皆属“在野”的学术，从不涉“项目—经费”之途，更非当今的“朝市之学”，拙作之学思与学界主流观念相悖。《中西文化形态论》（合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14年，45万字）、《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理论难题》（中国社科出版社2016年，38万字）、《中国文化之特质》（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35万字）三书，则是近年学术转向、学思迈向新台阶之作，是“学问求诚，不求诈”观念的新产物。

**插问：**我想了解一下《审美中介论》，为什么是“厚积薄发”？你孕育了多久？有什么曲折吗？你为什么写得那么快，一个多旬日草稿即成，学术冲动来自什么？

**答：**当年国家有正式文件规定：凡右派不能写文章（书），不能发表文章（书）。尽管是商务出版社的约稿，韦卓民先生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译者不能写“韦卓民”，只能另取假符号曰“绰然”。至于《判断力批判》下册的翻译，鉴于国际学术惯例，他必须署真实姓名（上册为宗白华，下册为韦卓民）。

这使我毛骨悚然：学术前途终结了！我在湖北巴东二中教书时，语文课中有周敦颐的《爱莲说》一短文（台湾哲学家周世辅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称周子是中国的康德）。周子说：晋陶渊明独爱菊，花之隐逸者也；世人甚爱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予（周子）独爱莲，花之君子者也。这就是主体（人）与客体（花）的二项式关系，但周子却见出了“主体—客体”的中间项第三项：“隐逸—富贵—君子”（中介物），颇值人深思。“中介”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其蕴含至今都没有被人猜透，仅知它是文化类型的凝聚与结晶，也是人生哲学和人格各异的焦点与闪光点。就此问题，1963 年国庆节，我压抑不住学思的冲动，便写了篇近六千字的论文“美学断想”，但无处发表，也无处投稿，只好冒失直寄上海复旦大学的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求教，以求困境中之“安身立命”（他曾写过中国“礼—乐”文化中的美学观念，非常深刻，令我感动），他收阅后，马上复信，体现了老一辈学人对年青人的关怀备至，这促使我坚定了我的三项式美学信念（见附件：周谷城先生的复信）其信曰：“承万同志，十月一日来信收到，多蒙奖饰愧不敢当。美学断想稍稍拜读，从知足下刻苦钻研，无任敬佩，锲而不舍，他日收获，将不可限量也。敬礼！周谷城 1963 年十月十一日。”1963 年国庆节，我刚摘帽才一年，学术的本性开始复苏。我之“中介物”的核心观念，一旦投胎于我，便日夜促我思考，将来有一天总会“呱呱”落地的。从 1963 年至 1986 年，整整 23 年呵，古人说：“十年磨一剑”，我却是花了 23 年。在这 23 年当中，时刻牢记韦卓民老师的叮咛，我奋力苦耕康德、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终于完善了哲学背景中的“中介论”。

其实，关于“中介”概念，萌发得很早。我在大学二年级时（1955 年）便认真阅读了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出版于 1895 年），他破天荒第一个提出“存在—意识”是一个曲折过程，并不是机械的反映。他的这一个观念影响了十九世纪俄国一代文艺批评大师，诱发了他们巨大的理论潜力，也挽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中介”概念，在我心中隐埋了几十年。使我深深地懂得了：马克思的理论，在庸人那里极易走向歧途（“美的存在决定美感”，是五十年代的主流理论）。马克思在年青时，还有一句与之相应的话：“我爱紫罗兰（花）谁也不能反对。”个体的尊严是何等高贵。许多人以马克思之名而践踏了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这是后人极易落入的一个巨大的理论陷阱，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性之“理论悲剧”。

《审美中介论》写作时，十多天时间，一气呵成，极少引文，以“发泄”胸中之积累为主。1986 年作为出版社的拳头产品“文艺探索书系”出版此书时，拙作在出版社内部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者“位卑人微”，皆不比其他三位作者：刘再复、赵园、余秋雨），只好送到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处鉴别裁判。蒋先生不问作者地位、是否名家，只看论著本文，阅后称誉本书是“异军突起，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且作了长篇“序言”以示祝贺！当年蒋先生是中国美学界尚活着的唯一美学权威（宗白华、朱光潜已逝）。于是“一锤定乾坤”，出版社的广告振撼大江南北，拙作连印十多万册，成为了当年的学术畅销书。时势造英雄也，于是我也暴得一点小名气，诱发了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招徕欲，后来王元化先生也夜读了此书，“彻夜难眠”，要把我从“位卑”的单位拯救出来，而到处奔走。但我一直不动心。《审美中介论》出版时，我已 52 岁的高龄了，“破罐破摔”是当年右派的根本观念。我想：能成为“人”，而非“牛鬼蛇神”便幸

福之极了，何必他求？！“朝市学术”及其一切的光圈光环，于我不相干。天高高，地厚厚，只要大脑能盈血，人都会有卓识。

**插问：**从你的作者简介来看，似乎你的学术历程，大体上可分成三大阶段：一、随体制而苟喘，论著多是残品或垃圾阶段（《审美中介论》属另类生活中挣扎求生的另一种产物）。二、退休后才出版了有自家心思、区别于主流的“朝市之学”的两书《中国美学（乐学）形态论》、《中国诗学道器论》的自主阶段，这两书和《审美中介论》，学界有人称为你的“三论美学”。三、近年学思跨上新台阶，在最高观点上审视中西文化之别，共有三书：《中西文化形态论》（合著）、《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理论难题》、带撰编性质的《中国文化之特质》的新视点阶段。从“残品、垃圾——到独立之中国美学形态与中国诗学形态——再到跃上中西文化之大别的新台阶”，这似乎是一条很艰难的向上之路。记得十多年前刘士林教授就说：劳承万治学的最大特征便是善于“打攻坚战”，绝不傍敲侧击，找冷门走邪道，或者零打碎敲。在我看来，这样的三大阶段便是刘先生说的“攻坚战”。你觉得符合实际么？

**答：**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所谓“攻坚战”，并不是退休后才形成的。那全部根源都在另类生活与《审美中介论》的积累过程之中启发。右派之另类生活，是起死回生的猪狗不如的生活。在挣扎求生中，会绽发许多横向观念：令你心窍洞开，拓通另一种神经通路，远离原始直观的“人”。中介论攻击两大块，提倡三大项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存在决定意识”公式中，产生了多少悲剧、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啊（“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它仅是时代的大历史框架，不能用在“理一分殊”的个体上。1949年后，大多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干出了许多反马、恩的丑事）。文革中到处都唱着“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亲”“天大地大，不如毛××的恩情大”（此是另一种“心窍”大脑神经通路只扎根于“权力”）。于是便到处出现了借“批斗对象”、凭空诱发出来了不可名状的陌生人的狂烈阶级仇恨，最后又落入“什么藤结什么瓜”“爹亲娘亲，不如××亲”的大陷阱中。因之，我的学术人生，并非条理的人生，或致思的人生，而是血泪混合拉扯、撕裂的惨淡人生。“玩学术”的把戏，与我不相干。人生的悲苦走到尽头时，说得不好听，是“狗急跳墙”，实际上是兵家的“图穷匕首见”。我写论著，那学术观念涌现出来时，其不可挡的助力，是一种“愤怒”！我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这不仅是观念，更是一种学术全局性关怀的愤怒！至于“中国无西方诗学”以及学术新台阶么，亦如是也！许多权威、名家都持“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庸俗观念与方法论。请看：莎士比亚在《威尔斯商人》一剧中，那闪光的情节观念是“割一磅肉”（不许割多一分，也不许割少一分，要绝对的准确）的西方数理智慧。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数理观念，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割一磅肉”的数理智慧，我们有的只是贯通古今历史气象的《窦娥冤》、《赵氏孤儿大报仇》的血统奔流。“数理一血统”是两码事；前者，属“逐物”的哲学；后者，属“心性”哲学。

**问：**树有根，水有源，你的学术成就很不平凡，正如刘士林教授称誉的你是“真学者”。就学术的渊源来说，许多人认为这与你的“康德主义”有关。你在大学

阶段，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受教于你的老师、著名康德专家韦卓民先生（1888—1976）。就中国现代学术流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学案。你能简单谈谈你学术生命中惨透的“康德主义”么？许多人都认为：读康德恐怕是一辈子的事，爬不上这个平台，学问难有成就。

**答：**可以的。这是一石激起我心中的千重浪！令我陷于痛苦的回忆中。究其实质是“人生—学术”相互交织的惨淡二重奏。可说是：残酷的人生与艰难的学术事业的混合史。此应该是本聊天录的中心与重点。但我不赞成什么“康德主义”的提法。只能说是康德哲学观念或方法对我的影响。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我的老师韦卓民先生说起，这是“欲近则远”的解析方法。韦先生是我们当年的逻辑学老师，又是家乡人，接近较多。1956 年中国学界的震天口号是“向科学进军”，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于是便提出“开放唯心主义”和“开放资产阶级哲学”的迷人口号。在华中师院的小礼堂里，那开风气之先，首位登场的教授便是韦卓民，他主讲康德的纯粹理性唯心主义。晚上，小礼堂中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大多是学生和年青教师。韦老师讲康德我们都听不懂，但在学术灵魂上却深深受感染，看韦老师的投入角色和学术激发的兴奋，使我们知道：此康德非凡人也。这是“学术印象”。在“阳谋”的掩饰下，1957 年韦老师和我都入了“右网”。我过于年青，不懂世事，则脑袋爆炸，天旋地转。而韦老师则“乌龟缩头”，开始打算张罗着未来的学术事业。他划右时，已经 69 岁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警诫年龄。然而他却昂首顿足般的奋起，要把康德引入中国大地，以康德的伟大口号“人是目的”来消解那“人是工具（螺丝钉）”的恶作剧。这是何等艰难危险而又巨大的学术事业呵！在此后的右派另类生活中，他发挥了他的哲学专业和多种语言（他懂八种外文）特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翻译了英国和加拿大等康德专家最重要的康德哲学入门书与启蒙书以及三大批判的康德哲学原著，共达四百多万字（《韦卓民全集第一至第五卷》），他自己的康德研究（近 60 万字），为全集第八卷 这些原汁原味的“康德精神”是国内学界进入康德堂奥的经典。不说别的，光是那本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商务印书馆）便是国内任何人进入康德的枕案书。

“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把它称为另一种的思想界的“哥白尼革命”并不为过。可惜至今此观念（工具）仍是“依然故我”。

韦先生高扬“人是目的”之“目的论”，有两大意旨：一、倡导“人生的哥白尼革命”。二是把康德之三大批判最后贯通统一起来。许多康德研究者，都不懂为什么第三批判的下卷又叫《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其要义是：1. “目的论”的来源是亚里士多德之“四因说”（形式因、材料因、动力因、目的因），不是康德的创造。康德是西方全面衔接亚里士多德的唯一哲学家。第一批判，为真（而非假）；第二批判，是善（而非恶）；第三批判（上），为美（而非丑）。第三批判（下），为目的论（而非工具论）。此曰：“真—善—美 $\leftrightarrow$ 目的论”是造物的一体结构，绝对不可分开。“真善美”离开“目的论”，则是一盘散沙，且失去灵魂与皇冠；“目的论”没有“真善美”的三足鼎立之支撑，则是虚无的目的论，或是许多人界说的：“老鼠之所以存在，目的是为了给猫吃”之荒谬猜测。为什么说，“四因说”是“真善美”造物的一体结构？为什么说“目的论”是统辖真善美的？先看亚氏的界说：“例如（造）一幢房屋，其动因为建筑术或建筑师，其极因（目的因）是房屋所实现的作用，其物因是土和石，其本因（形式因）



是房屋的定义——四因都可以称为智慧的学术，至于其中最高尚、最权威的，应推极因与善因（目的因）之学，终极与本善具有慧性——万物同归于终极而复于本善，其他学术只是他的婢女，必须为之附从而不能与相违忤”。

亚氏在《形而上学》中，接着说：“因为善与美不同（善常以行为为主，而美则不在活动的事物身上也可以见到），那些人（指苏格拉底的弟子）认为数理诸学全不涉及美或善是错误的。因为数理于美与善（我已）说得好多，也为之做过不少实证……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这一类因果原理”（同①第265页）。亚氏指出：善，是一种行为；美，是秩序，匀称、明确。美、善皆可以用数理诸学来计算的（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就是善”〈建筑师必须具备建筑术才能行善。美的名言是：3比2的黄金分割律。这全关涉到数理之学〉。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是平地一声雷，可以轰毁现存的一切观念）。在造物中（房子），美与善已具备了，那么“真”又是什么呢？不言而喻的，就是这个房子不是塑料或纸做的，而是“土和石”做的，是可以住人的。于是“形式因”（本因）中就包涵两个方面：一是土和石（材料因）造成的“可住”房子，此曰“真”（可以用数理计算的），二是这房子形态的静态审视（审美也是可以计算的），此曰“美”。善，是建筑师按目的因、形式因的要求，动用自己的建筑术，把此“土和石”建成了房子（完全可以计算的）。于是在亚氏的四因说中，便十分合理地包括了西方文化中的“真—善—美”，而且是造物塑型的一体结构，三者不可分，相互生成。最后统辖“真善美”三者的便是“目的因”（极因与本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真善美”如果没有“目的因”的统辖与贯通，便失去灵魂与底座，成为空中的飞絮；二、目的因绝不是凭空假设的，而是由“真善美”三足鼎立支撑的。回首国人对西方真善美和目的论的理解，与康德距离十万八千里。即使是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尽管写过亚氏“四因说”的专著，也以研究康德见长，但智者必有一失，他也只能按套式泛泛地大体上界说一下：真是科学；善，是道德（伦理）；美，是艺术。再也没有深入的剖析，更没有追根其来源。于是，西方的真善美和目的论便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中西混合概念，这和柏拉图的 idea（理念）中国化之后，再也不是柏拉图专家陈康先生说的，其丰富的义蕴，似是一个谜，难于准确翻译。连中国的股长、科长都会说：“我们的‘理念’是…”这里的“理念”就是“理性的概念”。于是乎那个柏拉图就变成中国的最劣等的厨房工友了。由此观之，西方理论一旦中国化，大多是一种笑料。

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到康德哲学体系，其线索可概括为：康德的广义“目的论”（康德审美第三契机：“形式的合目的性”，也来源于亚氏的“形式因与目的因是叠合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环节：自然界无目的而有目的（花开的目的是为了结果）→人界的自觉目的→人界的最高目的：道德目的（趋向道德神学）。在最后的第三环节中，终于以“道德神学可为三大批判立法”（即为真善美立法），把三大批判统辖起来了。于是康德哲学的“人是目的”是一个振撼乾坤的大律！在这里需补充两点：一、康德的“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思虑已久，在第二批判的结语处提出了“我心中的道德律”，对峙于“我头上灿烂的星空”之“自然律”，他开拓了从自然界走向道律界的大门；在第三批判（上卷）结尾处，又粘出了人类审美最后走向道德的皇宫，曰“美是道德的象征”。最后下卷以“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作结。在康德哲学的倾向中，“道德”是一个重大转折。

二、但康德的“道德”依据仅是“三个设准”（上帝存在、绝对理性、自由意志），阿多诺在《道德哲学问题》一书中，直接指出康德的“道德”依据就是那个“纯粹理性”。故康德的“道德”（绝对律令——勿偷盗）与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康德之“道德”源于纯粹理性；中土之道德，源于心性之“仁义”，即源于“孺子将入于井”的不忍人之心。但又可以说，康德来到了中土道德的跟前，而未入堂奥。

**插问：**应该说，您这一番论述，是对康德哲学迷团的一大疏理，也使我明白了许多问题。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康德哲学论著中的“逻辑建筑术”是什么东西？是传统使然，还是自我创造？

**答：**所谓“逻辑建筑术”，并不是别人对康德的评论，而是康德自己的得意称谓。这也是从亚里士多德的 10 范畴论那里来的。亚氏的 10 大范畴系列是：1. 体（有一个东西是什么），2. 性（质），3. 量（多少），4. 关系（与他者相比较），5. 地（空间），6. 时（时间），7. 处（处于何种状态），8. 模态（存在之样式），9. 施（主动状），10. 受（被动状）。这 10 大范畴，就是亚氏用来描述一“物”当下存在着的各种状态，它们构成了一物在此时此地严密之观念大系统。但康德将 10 大范畴过滤收缩为 7 大范畴：体—质、量、关系、模态、时空。体、时、空是物的先验存在，质、量、关系、模态，是此物的普遍性存在与运行方式。康德抛弃“施、受、处”三大范畴不用，认为是一种“累赘”，不能进入哲学概念的普遍性运转中。例如“审美四契机”便是一种“逻辑建筑术”：1. 质（无功利而生愉快），2. 量（无概念而具普遍性），3. 关系（形式之合目的性），4. 模态（无概念而具必然性）。各个《批判》都有逻辑建筑术。

**问：**“人是目的”的意义何在？请你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

**答：**韦卓民以 70 多岁的残命把康德“人是目的”输入“人是工具”的糟糕世界，不啻是为人类除病、除害，终于把“人的尊严”树立起来，这并不亚于把人从当今的“新型肺炎”大疾中挽救出来。“人是目的”是人性复苏的强心剂，也使我从艰难中站立起来。终生不能忘记！我被可怕的“阳谋”击倒在地上之后，使我能站立起来的唯一支撑大柱，便是“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2020 年 10 月我应广东开放大学之邀，到此校讲学。其后，该校党委书记陪我一同到珠海寻访韦卓民老师的故居。到目的地后只见一片拆迁的凄凉，人去楼空，门上只有一把生锈的大铁锁。韦老师 1976 年去世，在那黑暗时代，未见天日。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共 19 年，他已 88 岁了，但他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思之而潸然泪下。他的尸魂虽远在武汉，但落叶总得归根呵——故居是什么——一把铁锁而已！呜呼！！

**问：**“人是目的”的伟大理想与卓绝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有吗？

**答：**马克思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个理想。《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基本结构、框架，便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所谓“正”，便是人类的原始丰富性；反，便是私有制对人的异化；合，便是人类经历多个阶段后的本性复归（扬弃私

有制后），即马克思的名言所示，做一个“上午绘画，下午打猎”的自由人。《手稿》的重点是“反”，即私有制对人的可怕“异化”。我当年便发现了落入“阳谋”中的“右派”，便是某公的“阳谋”对人的异化物。从马克思的名言和某公的“阳谋”中，我终于“认识了我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不可战胜的精神财富！不然，我早就自杀或放弃了自身的存在了。归根到底，我的精神的支撑物便是康德的“人是目的”与做马克思说的“上午绘画，下午打猎”的自由人观念。1957年7月我从武汉关坐大轮船逆水而上，穿三峡、入巴东、进恩施山区，身上带的《纯粹理性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书，并没有白费。唉，这是右派人生漂泊的压舱石。

**问：**你身处“逆境”的事已谈了不少，以学术求生之举也很动人。我想以上两方面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以后有机会还要请你补充，向你请教。下面我想请教你在逆境人生中的“学术收获”的事，能解析一下吗？

**答：**这是两个颇为相互牵扯、撞击的矛盾概念。逆境人生，是痛苦的象征；学术收获，是一种快乐的事情。我自己的体验是下面三点：一、我终于煎熬过来了，脑壳仍在我肩膀上，没有落地。我是“另类人”，也铸造了“另类”的大脑和神经通路，这是一大乐也。二、“我的存在”，不是虚无的存在，或神的存在，而是《孝经》中指出的那个“身”的存在。《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若身之不存，世界之虚无也！三、精神生产不是什么虚构、伪造，更不是时髦观念的冲动，而是“愤怒出诗人”（恩格斯）、“痛苦出智慧”（19世纪俄罗斯士人的卓识）的分泌物。一句话，是人生之“安立身命”。“知足常乐”，是中国人的伟大信条。

2019年我改道到湖北巴东野三关避暑。1963年我教过的两班初中学生聚会（有30多人）。师生离别近半个多世纪了，但那师生情却不减，这次见面，大家激动得痛哭流涕，令我感动，当晚，学生叫我把半世纪分别后的大致情况告诉他们，我一一说了。最后我说：我的人生有两个满足：一、我的《审美中介论》在学界之影响，有许多人对我说：我是读你的《审美中介论》成长起来的。二、今天学生对我的深情，半个世纪而不减。学生激动的泪花，是我的人生镜子。有了这两个满足，我的人生是多么充实呵！

**问：**最后，我想提一个关于学术理想的问题，您今年已87岁了，思维清晰、敏捷，身体也很硬朗，请问您在学术上还有什么打算？现在许多人都“看穿”一切，无心于“内卷”，自得于“躺平”，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了，把“身”保住，便万事大吉，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答：**人生将到尽头时，总要回首一下“人生风景”与“学术之路”的。当今许多人都是以“著作等身”为荣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坏的概念，《论语》1370字，《孟子》34685字，《大学》1546字，《中庸》3406字，四者加起来才五万多字，比一篇当今的硕士论文略多一些，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连注释，才24万字，字数仅相当于当今博士论文。如果孔孟都“著作等身”了，那绝对是中国文化的大灾难。当今许多所谓名家，往往是“文集十大卷，真知无一句”，请恕我的刻薄吧。我总是忘不了钱穆先生82岁后眼睛失明了，不能读书，也不能看

报，只想把自己的一生二千多万字的论著，来一个眼睛失明后的反思与总结，于是最后写出了 80 多万字的《晚学盲言》（上下册）。大体上说，看了钱先生这 80 多万字的盲言，也能基本上把握了他那两千多万字的“山川巨流”；又如王元化先生，他常说，一个人写论文、著书，其中确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真知），是很少的，多是铺垫、背景，不得不应酬的套话或废话，其间能有十分之一是自家的便很不错了（“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于是他把自己诸多论著中属于“自己”的东西（真知），抽出汇聚一起，曰《思辨短简》，才十多万字。钱、王二位是当今著书人的典范！鉴于此，我也想把一生的学术（只出版了十二本书），用“追根一索源”的办法，简化为一本二、三十万字的《根系学术形态论》。书稿已完成了，放下了一宗心事，但难以出版，书号费从二万、三万涨到七万、八万。若从工资里拿出七、八万元虽不难，但一反思，又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之举，鄙人不为也！1986 年《审美中介论》的稿费是七千多元，那时我的每月工资才 70 多元，稿费是我当年工资的百倍。当今不但无稿费，相反，倒要拿工资去买书号。这叫我难以容忍！一谈起出版系统的改革，我便要骂人：这是当今学术腐败的重大根源。

**问：**劳先生，你放心，我会从我自己的科研项目经费中，支持你一下。但尚未凑够，大家都等待命运吧！

**答：**首先感谢！一千年前大史学家刘知己（661—721）曰：“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大史学家的识见，真是难以更易的铁律！